正常化國家國民的心理建設

●李敏勇／知名詩人

●陳雪琴、蘇芳誼整理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很久沒來出席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活動，這一次基金會邀請我來討論的題目是「台灣正常化國家國民的心理建設」。

2016年1月16日台灣人民以過半的選票支持蔡英文當選總統，每一張選票背後代表著人民的期待，我們高度期待五二〇蔡英文正式上任之後，面對百廢待舉的國政能有一番作為，開創台灣政局革新的新氣象。我們充分感受到大多數人對台灣新政局的一個期待。

台灣是不是會變成一個正常化的國家？相信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雖然充滿著期待，仍感受到些微的擔心，高英茂教授剛剛在他的談話中也提到，我們有期待、有關心，同時也有一些擔憂。

回顧台灣從1996年到2016年的政局發展，過去二十年從1996年台灣人民開始直選總統以來，我們已經直接選出四位總統—分別是李登輝時代（1996年～2000年）、阿扁時代（2000年～2008年）、馬英九時代（2008年～2016），以及到現在2016年才剛要開始的蔡英文時代。上述這四位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總統，理論上或是在台灣的講法常說：我們人民直選總統，所以台灣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表面上給人的感覺，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際上卻又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這其中涉及到對於國家的認知—包括：內部的共識與內部的國民意志。有的國家在建國之初，雖然並未得到外部的承認，但是至少內部的國民意志早已成形，無礙於它已成為一個國家的事實。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正式建國開始，一直到1971年進入聯合國之前，並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不過這並不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一個國家的事實。

台灣未來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顯然需要具備兩項要件，一個是內部條件，另一個則是外部條件。所謂的「內部條件」就是國民意志；而「外部條件」就是國際承認，其中又包括部分的國際承認與完全的國際承認，欲達成這個目標可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無論如何，當前的台灣應該是一個國家，但又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這個現狀背後存在的是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的焦慮。

我們看總統直選二十年來的發展，非常期待蔡英文總統走出這二十年發展的新格局，過去李登輝時代最大的貢獻當然是推動民主化、本土化的教育改革及政治轉型，在卸任時交給我們的是「特殊的兩國論」。我們平常所指稱的國家屬於一般性及普遍性的國家，在前面冠上「特殊」這兩個字，個人認為反而凸顯出不是一般性的特質，對台灣與中國之間是一般性正常國家間之關係作了保留。

李登輝之後就是阿扁執政的時代，從2000年到2008年為止，在這八年期間，陳水扁總統的表現有兩個極端：從「四不一沒有」到「一邊一國」，這其中存在高度的對比。國際社會從來沒有出現一個國家是自我否定型的國家，阿扁的「四不一沒有」—不宣布台獨、不更改國號、兩國論不入憲、不推動統獨公投，以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這個「四不一沒有」的內容，不是只有四不而已，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五不才對，凸顯台灣的困境。2000年陳水扁總統剛上台，當時的台灣意識高漲加上民主進步黨又掌握執政權，怎麼會提出「四不一沒有」的主張？令人不解。阿扁總統提出「四不一沒有」之後，效果不如預期，又轉而走向「一邊一國」—「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論述，兩者出現高度的反差。無論如何，李登輝時代與阿扁時代，兩個政府都表示台灣是一個國家，就某種程度而言，兩者看似一個有加分效果的進展。

然而在2008年到2016年這八年之間，台灣在馬英九主政下，我們又走回殖民性統治國家的路線—亦即中國殖民統治台灣的國家類型。我們好不容易熬過八年的痛苦之後，2016年台灣人民選出蔡英文擔任總統，五二〇之後，蔡英文將展開新的總統任期。在此，個人利用一個三角形的圖示來比喻，馬英九是殖民性國家的代表，而李登輝和阿扁則雖然是代表台灣人的總統要帶領台灣人突破這殖民性的台灣國家，但是他們二人不僅各自的政策、作法、教養性有所不同，表現出來的方式也不相同。現在剛上任的蔡英文總統，僅管我不知道她會如何面對上述這三種不一樣的民選總統的台灣國家的形成，但是我非常期待她能在李登輝跟阿扁以及馬英九這三種之間，找到一個對台灣要走向作為一個正常化國家，比較好、更進步、較能建構台灣國家條件的作法。或許到目前為止，蔡英文政府的表現並不如我們所預期的，如同剛剛所談到的新政府其實並不新，不論是在外交部、陸委會等人事的安排上，可以看到其中存在著進步與不進步的矛盾現象，顯見我們並未能全盤掌握政府整個體制的運作。

回過頭來，當我們在談論國家的議題時，台灣的人民通常比較聽得到的部分，大多是法政的條件。台灣社會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探討政治性的議題時，最常出現在報章雜誌或媒體上的不外乎是法律或政治方面的學者或是政治人物，我們反而很少發現台灣比較普遍的文化意見，針對台灣國家未來的走向提出看法。大多數台灣人雖然接受蔡英文作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總統，但是我們卻沒有去想說，台灣人現在面對特殊的情形是怎樣？在此所謂特殊的情形，是指我們大多數人是寧可選擇經濟的地盤，放棄文

化地盤的一種特殊形態的人民。這是怎樣造成的？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台灣人是被大清帝國所統治，「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長達五十年，台灣人民成為日本國民。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當時絕大多數殖民地相繼爭取脫離母國而獨立，唯獨台灣是例外。這個特殊例外的案例，為什麼會出現在台灣？並不是因為當時台灣經濟、社會、教育或文化等外在條件不如人，當大多數追求獨立的殖民地陸續擺脫殖民母國的束縛，台灣之所以沒有跟上世界發展的腳步，主要是因為台灣人身上所背負的中國文化、中國族群主義的包袱所影響。對此，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蔣介石政權展開軍事戒嚴威權統治之前，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可以發現，台灣人民爭取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決心，以及形塑建立一個國家的國民意志，個人認為並不夠強烈。

以下我要用幾個層面來討論台灣當前必須克服的挑戰，第一、台灣目前的社會現狀，不論是台灣人或是很多中國國民黨支持者的表現，可以看出大多數的台灣人身上普遍具備一種「被殖民症候群」及「殖民症候群」的特質。有一大群台灣人認為，無論誰來管理台灣結果都一樣沒有差別。過去台灣曾經被日本人統治過，二次大戰之後世界各殖民地相繼爭取獨立，台灣人也沒有獨立建國，隨後台灣人又歡迎來自祖國的政府來管理台灣，甚至現在還有人看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未來的世界強權，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統治台灣。這種「被殖民」的病徵在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算是存在台灣社會中很久一段時間的集體病症，這種病徵表現在外就是出現任何人來統治台灣都沒有關係的心態，只要讓我們有錢可賺、有舒服的日子可過就夠了。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國民黨還能夠繼續統治台灣，就是吸收部分台灣人進入統治結構之中，同時給予特權分享利益，使這些進入統治結構的台灣人樂意配合擔任共犯。另外，在許多台灣人的宗教意識中，也不乏升官發財觀念的非宗教性意識，這種非宗教性的意識形態強調如何在殖民統治下擔任政府的高官或是在商場上有好的發展賺很多錢，他們寧願拿大筆的金錢賄賂官員，以換取更多更大的利益，也不願意誠實繳稅給國家，這是台灣人自己非常需要反省的性格。

第二、台灣人常見的第二種病症就是「殖民症候」。二次大戰之後，跟隨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的黨、政、軍、特體系的人，雖然他們的人數所占的人口比例屬於少數，但是這些人本質上是認同中國國民黨所灌輸給他們的大中國思維，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人僵固不化的意識形態，即使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統治整個中國大陸，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次，至今仍不願意面對現實。這類具備「殖民症候群」特性的人甚至自願作為中國買辦，馬英九正是這類的典型。因此，作為台灣國民我們若要去重建國家，必須藉由「文化」去面對並突破「殖民症候」與「被殖民症候」兩項病徵。由此顯見，「文化」這項要素非常重要，與台灣國家正常化是息息相關的。

基本上，文化具備幾個思考的層次，值得台灣人深思：

第一、作為人，主要可分為身體及精神兩個面向，對此，個人認為台灣人普遍重視身體而輕忽精神。以偏重身體的角度來看，如果以社會來看，社會有其身體的面向—即經濟條件，就是強調物質發展的過程，可以賺很多錢以進一步從事建設。另外，社會也有精神的面向—亦即文化。由於台灣社會普遍是偏重身體而輕精神，影響所及，我們的比較重視經濟的發展，這也就是為何包括蔡英文在投入總統競選活動的時候，她所面對最大的考驗就是如何解決台灣經濟發展的問題。大多數台灣人希望能夠賺得到錢、吃得很飽、穿得漂亮、使用品質很好的東西，過著物質條件豐富的生活。然而這種一味地偏向身體而忽略精神層次的外在表現，算是一種病症。為什麼？因為長久以來台灣人從未有過自己的國家，被殖民統治之後，台灣人覺得對自己負責的方式就是賺很多錢，同時無條件接受這些外來統治者硬塞給我們的文化。長期下來，無論是現在上台的蔡英文政府或是之前的陳水扁政府，並未能有效掌握文化的詮釋權，最具體的表現可從當前的平面、電視媒體與學術界的重要主導者都不是將確立台灣主體文化作為主要訴求。在台灣的文化界像我這樣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致力爭取台灣文化的解釋權的人並不多，而民主進步黨本身也沒有很看重台灣文化的發展，加上長期受到中國殖民統治的影響，中國文化的框架早已牢牢地掛在台灣人身上無法擺脫。

第二、從歷史及地理的面向來看，台灣必須去確認以下幾項內涵：

（一）台灣的歷史與中國或者是世界其他國家有所不同，我們最早是原住民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隨後才有來自唐山來的人移入台灣，逐漸與原本在台灣的平埔、原住民族一起在台灣生活。後來又經過荷蘭、西班牙、清帝國、日本的統治，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演變與發展等等，使得台灣的歷史經歷走出與中國歷史發展不一樣的道路。台灣人應該瞭解台灣的歷史脈絡有別於中國，包括：1949年跟隨中國國民黨政權渡海來台的這些人，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早已落腳在台灣應該也算是台灣人。他們必須面對歷史事實，並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建立一種歷史意識，並從中找出未來應該要走向何方？這是我們未來推動歷史教育的改革所不可忽略的課題。

（二）空間性的意識，簡單講就是地理觀。很多台灣人在大中國教育的洗腦下，雖然我們居住在台灣，但卻不是以海島的意識看待台灣的定位，而是以中國大陸的地理觀，將台灣視為中國的邊陲。台灣是一個很小的海島，有中央山脈將台灣分成東、西兩側，台灣也被遼闊的海洋所包圍。我們必須透過上述台灣特殊的歷史與地理特質，確認台灣與中國的不同，也與世界其他國家有所差異。

（三）在我們完成歷史的與地理的定位場所等不同的區別之後，接下來就是要確定

作為台灣國民的身分。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面對他的國家或政府時，不論是他所享有的權利、該負擔的責任或義務，與沒有國家公民身分的權利與義務都有所不同。而台灣的國民與台灣國家關係的發生，乃是連結在法律條件屬性下人的關係之上，也就是國家與國民的關係乃建立在法律條件為前提的關係上，這是每一個台灣人要有的重要概念。一直以來，台灣人民並沒有一部自己的憲法，以致於始終未能建立與釐清人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利與責任的關係。因此，當務之急就是透過台灣憲法的建構，利用新的台灣憲法創造共同體的意識，這是我們未來要去突破的挑戰。

（四）台灣要參加聯合國，聯合國是二次大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一開始有五十幾個國家後來擴大為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其中有大國、小國，也有國力較強的國家與國力較弱的國家，聯合國成立的目的就是協調處理這些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發展雙邊或多邊正常的外交關係，進而維持國際秩序與促進世界和平。台灣作為世界地球村的一份子，不應該在聯合國這個世界舞台上缺席，以台灣的名義參加聯合國為會員國，是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基本要件。

以上這四個條件我覺得對台灣人而言缺一不可，我們千萬不能說我只要做生意有錢賺，什麼人來管台灣都一樣。由此可見，國民的意志和感情對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很重要的要件，過去曾經有人說過，台灣需要進行重建，其作法就是在台灣人重新取得執政權之後，透過教育、文化再造的手段，將長期被破壞的文化條件進行重建。

總而言之，台灣人必須具備以下的認知：（1）自我意識到自己是台灣的國民；（2）做一個自由的人；（3）作為文明的孩子。也就是說，台灣人要成為一個人的基本要件，首先要作台灣國民，因為當代國際社會所有的人都存在於自己國家的條件裡，作為國家條件的國民，面對其中一個很大的共同體就是國家，另外一個較小的共同體就是家庭。日本所謂的「核社會」（核心社會），就是指家庭，他和國家是人解決生存問題最密切的兩個團體，這兩個團體與基金會或學校之類的其他團體都不同。這兩個團體有其特殊的關係，譬如家庭中夫妻與小孩之間有特殊的關係，國家與國民之間也有特殊的關係，但家庭的特殊關係比較有文化性和經濟較有關，而國家與國民的特殊關係則是法律關係、法的條件與權利的責任。顯然，我們作為台灣的國民，作為自由人，作為文明的孩子，是左右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希望新上任的蔡英文政府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省思過去在李登輝時代、阿扁時代及馬英九時代領導國家向前進的過程中，檢討各項政策的利弊得失，找出一條真正適合台灣發展的道路。其次，面對現實來自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個人認為強化國民的意志非常重要。政府面對內外的嚴峻考驗，短期內雖然可以提出一些權宜之計作為因應，但是卻不能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迴避凸顯台灣人民真正的心聲與訴求。如果我們繼續因

循苟且，就有可能跟以前的祖先一樣，再將這些長年累積下來的問題又留給下一代處理。我們不希望下一代的人還在討論台灣國家要如何正常化的課題？如果我們今日不解決，難保未來的子子孫孫有機會再討論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問題。很多政治人物常常說，這些問題是未來才有辦法處理的事，主張要把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交由下一代來解決。我認為每一個當下的現實，就是要把這個現實上的問題在我們的手中來解決，這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yes」or「no」答案是很清楚的，比較不清楚或困難解決的，則是台灣是不是一個好國家的問題？最後，台灣已是一個國家，希望這個問題解決後，我們應該將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層次，也就是台灣該如何成為一個好的國家的問題。◆